



老舍的世界与世界的老舍

谢昭新

2014年，老舍《四世同堂》英文原译稿在美国被发现，小说第三部分《饥荒》中遗失的部分被回译为中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等相继推出《四世同堂》完整版，再次引发人们对老舍作品海外传播与研究的关注。

老舍不仅在英国、新加坡、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留下了亲切而富有影响力的足迹，其作品也因鲜明的民族性、现代性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20世纪30-40年代： 走进英美世界

老舍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作家。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他用小说《二马》告诉中国读者英国人和伦敦的形象，伦敦也因这位中国作家的到来而永远记住了他：2003年，英国遗产委员会为老舍位于伦敦圣詹姆斯花园路的故居镶上陶窑制成的蓝牌子，上面写着“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伦敦期间，老舍帮助艾文斯顿翻译《金瓶梅》，在东方学院做“唐代的爱情小说”讲演，编写了一套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汉语教材《言语声片》……伦敦于1946年出版了伊文·金英译本《骆驼祥子》，开始了老舍作品在英国传播的历程。

老舍在海外的传播以英国为起始，但在英国并未兴起“老舍热”。世界“老舍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1939年，翻译家高毅首次把老舍介绍到美国文学界。1944年，翻译家王际真首次把老舍小说翻译成美国。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老舍赴美国讲学，提高了其在美国的知名度。他与浦爱德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第3部《饥荒》，与郭秋合译《鼓书艺人》，这些译本和《离婚》英译本等一道，让美国读者得以熟知这位中国作家。尤其是伊·文金翻译的英译本《骆驼祥子》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次年即再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骆驼祥子》在美国的轰动，也带动了其他西方国家对老舍的关注，瑞典、法国、捷克、波兰、匈牙利、苏联、德国等国也纷纷推出译本。

20世纪50-70年代： 在日本苏联形成热潮

第二次世界“老舍热”以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苏联为主体。日本是世界传播老舍作品最早的国家之一，1939年就有《大悲寺外》的日译本问世，上世纪40年代陆续翻译出版了《小坡的生日》《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同期还有十余篇介绍评论老舍与

《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的文章发表。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老舍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形成热潮：《四世同堂》《老舍的哲学》《离婚》《龙须沟》等一大批小说、戏剧作品被译成日文出版，并有《老舍论》《老舍年谱》等一批高质量论著问世。

在苏联，上世纪50年代老舍的三次访问，使他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短短几年，苏联共出版了近30部老舍作品，包括1953年的《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选》，1956年的《老舍短篇小说、剧本、散文选》，1957年的两卷本《老舍文集》。大批翻译成果带来了丰厚的研究。据统计，仅1953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的30多年间，苏联共发表、出版了老舍研究论文、论著约120篇（部）。

世界第三次“老舍热”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兴起的。1960年至1979年，在各类报刊发表的有关老舍的文章约80余篇，显示出“老舍热”的特点：一是对老舍人格精神的赞赏和对老舍的悼念；二是对老舍文学思想、创作道路的综合研究以及对《二马》《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的评论。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广泛传播 大放异彩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欧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兴起了第四次世界“老舍热”，此次“老舍热”的特点，一是老舍作品翻译传播范围扩大，涉及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骆驼祥子》为例，形成了多达20余种不同的文字译本，仅日文译本就有10种以上。1981年至1983年，日本学研社出版了《老舍小说全集》（共10卷本）；1984年，全日本老舍研究会成立。在美国，至1981年，《骆驼祥子》又有3个译本面世；在韩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仅《骆驼祥子》译本就有5种；泰国也有《骆驼祥子》泰文版本。

二是老舍研究深入展开，研究队伍扩大，成果丰富多彩。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发表有关老舍的论文、小传、年表、访谈等文章400余篇，出版老舍年谱10余种。日本老舍研究资深专家伊藤敬一还首倡“老舍学”。日本学者中山时子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老舍事典》、柴田芳太郎的《老舍与中日战争》、伊藤敬一发表的15篇有关老舍小说、戏剧的系列论文等研究，显示了日本学派的实证、求精细的研究特点。在苏俄，安季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博洛京娜的《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司格林的《伟大的幽默大师》、谢爱诺夫的《论老舍的话剧》、罗季奥诺夫的《老舍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老

舍研究系列，凸现出苏俄学派从社会学视角研究老舍的宏观大气。在美国，有王德威的博士论文《现实主义叙述的可能性——茅盾和老舍的早期小说研究》、陶普义的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老舍早期小说艺术成就的独特审视、李欧梵的《老舍（黑白李）的心理结构解读》等，显示出美国学派老舍研究方法多样、视角新颖、注重从审美人手的特点。德国的凯西对老舍作品女性形象的研究、格哈德·罗德对《茶馆》的论述、法国的保罗·巴迪对老舍小说的文化史、风俗史的探讨，波兰汉学家斯乌普斯基的《老舍小说分析》、匈牙利福寿福的博士论文《〈骆驼祥子〉中所运用的语言》，新加坡王润华的《老舍小说新论》等，是海外老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世纪以来： 戏剧演出带火老舍作品

新世纪以来的世界“老舍热”呈现了老舍作品改编与演出的新景观。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即将《骆驼祥子》改编成名为《一个名叫骆驼的人》的广播剧在东京电台广播，使得祥子、小福子的名字家喻户晓。2002年11月，京剧《骆驼祥子》在日本演出7场，场场爆满；2015年9月，中国原创歌剧《骆驼祥子》意大利巡演，受到意大利广大观众热烈欢迎。

尤其是话剧《茶馆》的演出，创造了世界级的“《茶馆》热”。1980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50天，巡回15个城市的访问演出，掀起了欧洲“《茶馆》热”，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1983年，《茶馆》在日本演出，掀起了日本第三次“老舍热”。1986年4月《茶馆》在加拿大演出12场，6月在新加坡演出6场。

新世纪以来，《茶馆》的魅力在欧美国家经久不衰。2005年8月，《茶馆》在美国华盛顿、旧金山、休斯顿、洛杉矶、纽约5座城市的16场演出，再次掀起美国的“老舍热”。2016年，《茶馆》又一次在加拿大演出。除了经典版的《茶馆》外，孟京辉执导的先锋戏剧《茶馆》自2018年10月在乌镇首演后，开启了德国、法国、北美等地的世界巡回演出，同样受到广泛关注。可见，《茶馆》在国外演出，不仅掀起了老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研究热潮，更将老舍的戏剧融入世界三大演剧体系中，凸显了老舍戏剧无限的艺术魅力。

从走出国门开始，老舍的海外传播与研究历经百年历史，历久弥新，凸显了老舍及其创作长久的生命力。（作者系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题图由老舍之女舒济提供。）

我还算个爱旅游的人，不过不爱逛景点。一方面哪儿都是人挤人，低头十万双脚，抬头十万个脑袋；另一方面，我对名山大川或者名人踪迹也没有那么高的热情。说得“装”一点儿，我的兴趣不在“自然地理”，也不在“人文地理”，主要在于“生活地理”——到哪儿我都愿意在街上瞎转悠，看陌生地方的人怎么吃饭、娱乐、跟老婆吵架，不管人家过得跟自己一样还是不一样，都算没白来。都说作家要“深扎”，我“扎”得可能不深，但“扎”的方向或许能让自己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对于常年生活的北京，此类印象当然更深一些。外地朋友爱说北京“大”，“大”让北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息。以前作家王朔就说过，胡同里的“老北京”和城门外的“新北京”不是一个“北京”，现在何止于此？朝阳海淀不同，城南城北不同，商务区、科技区和住宅区又各有不同。有时只隔一个街区、一条马路，街上人的状态就全不一样了。而我想，如果写出某一个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区域，就算写出了今天北京的一个侧面。选择麦子店这个地方写篇小说，大概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麦子店在北京不算多么特殊，坐落在东三环附近，人口比较密集，原先尽是老工厂宿舍，后来也见缝插建了一些豪华或时尚的场所。这种地方当然也是本地人和外地人混居。因为交通方便，又有不少用于出租的旧房子，因而就成了相当一部分“北漂”最初的落脚点。有一阵我老在那儿吃饭，饭馆的人气明显比城西城北要旺，有些地方恨不得用英语点餐，有些地方恨不得把你轰到门口蹲着吃。也常看到年轻人在街上焦躁地游荡，充满目标但又没有目标，寻找方向但又漫无方向。焦虑多了自然迷惘，有了迷惘才能发生故事，因此《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或者可以定义为一个有关迷惘的故事。

当然，这个迷惘的故事仍然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比起超凡脱俗之士，普通人的迷惘没有那么幽微而百转千回，但因为它之真切而更有象征意义——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主人公王亚丽的困惑之处在于：出门讨生活，除了混口饭吃，是否还需要在精神上找个依靠？而她身上的悬念在于：当外在的精神依靠倒塌，又能否从自我心底发出证明“人之为人”的力量？故事当然会有冲突、纠结和误会，但在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相信人的“一念之善”——当王亚丽饱受欺骗、被勒索的苦楚之际，仍然爆发出某种救赎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篇以情节高潮为叙述方向的小说，我尽量让高潮同时出现在人物的心理层面。

写这篇小说，对我来说也是进一步认识北京的过程。我在北京出生长大，动輒有人对我说“你们北京人”，但听到这话，我却总想说，“我们北京人”还真代表不了北京。只有本地人的故事，太单调了，也不切实际，难以容纳我在这座城市感受到的复杂性。不只北京，我想上海、广州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写小说的人，能否通过一个关于精神领域的故事，反映出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又能否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外，抓住城市生活中更日常、或许也更本质的特点，也即“生活地理”？具体地说，当故事里的普通人只用他的言行就能让读者感到自己正在看的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个故事才算完整。

不知《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在这方面做得是否成功？但我愿意朝着“生活地理”的目标继续探索。

◎新作推介 ——评李遇春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

李遇春的当代文学研究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下文简称《涅槃》），采用宏观分析和微观解读相结合的方式，俯瞰中国文学传统的转化，透视名家经典小说的延传，形成了明确的学术自主性，即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以重塑中国形象作为目的”。

李遇春将中国文学传统从“对象”转化为“方法”，源于深刻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学传统只是静态的对象化存在，作为“方法”的中国文学传统，则是审视既定话语模式的一个重要支点，可以借此将流行的文学史观和批评话语重新问题化，进而在古今通变与中西融合的视野中丰富我们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认识。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将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视为3次连续性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将“复兴论”作为建构百年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这种“复兴论”是对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双重反拨，重视“启蒙”或“革命”对激活传统的重要意义，将文学传统视为百年中国文学持续不断的构成要素——“表面上看，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艺运动笼罩着强烈的西方色彩，但在骨子里却是复活后的‘中国根底’。”这一范式跳出了中西与新旧二元对立的理论窠臼，体现了新时代复兴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在逻辑。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发现“寻根文学”的文学史意义被远远低估。他认为，应当把“寻根”看作近40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潮”。从新时期文学之初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文化小说和笔记小说，到莫言、韩少功、贾平凹等“50后”旗帜鲜明的寻根文学，再到苏童、格非、余华等“60后”先锋作家回归传统的转向，付秀莹、乔叶、李修文等“70后”作家笔下潜滋暗长的种种本土文学传统，以及更年轻的新世纪作家（包括网络文学作家）在整体上回归传统的倾向，都是寻根“主潮”在不同时期的体现。以代际方式梳理文学史脉络当然难免疏漏，但借此线索显然更易发现，40年来的中国文学一直以“寻根”的姿态践行着“中国的文艺复兴”。

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李遇春在展开理论辨析的同时，也进入鲜活的文学现场，深入分析当下小说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学传统的实践。第二编和第三编正是以个案研究方式对第一编宏观思考做出的回应。

作者发现，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秦腔》《极花》等小说“以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直指世相人心”的新变化，将其命名为“微写现实主义”，并视其为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新趋势，而这种“微写现实主义”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产物。《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是“微写现实主义”最直接的催生力量，西方的文学资源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但“都立足于中国本土写实文学传统而发生内部蜕化或蝶变”。此外，李遇春从传统文化和文体两个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出发，对刘醒龙、欧阳黔森、姜天民、迟子建、乔叶、张好好等作家的解读也十分精到。刘醒龙的《蟠虫》和《黄冈秘卷》一方面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人人格，另一方面赓续中国小说的野史杂传传统，二者均指向“大（杂）文学”或“大（杂）文体”的文学传统；欧阳黔森的地方志小说将中国文学中的博物传统、传奇传统、抒情传统三者有机结合；姜天民的“白门楼印象”系列短篇小说里的异人轶事和野史杂传色彩、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文体美学及其历史叙事传统、乔叶的新世情小说、张好好的地方性叙事无不都是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实践。

李遇春认为：“启蒙、革命和复兴，分别是理解百年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三个话语向度，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三位一体的和合共生状态。”以中国文学传统作为方法，有助于在长时段文学史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开放地调动古今中外的文学经验，昭示着多元的文学图景和对话立场。这种研究路径既非盲目复古，也非时髦追新，而是旨在超越中/西、传统/现代等二元思维模式，重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其实质是一个不断发现中国文学主体性，并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中国主体性的过程。

《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出版

本报（小章）曾以长篇小说《夜照亮了夜》高居“豆瓣读书”9.0分的殊荣，近日推出新作《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天津人民出版社）。该书讲述一个自由撰稿人离开人潮涌动的北京，决定写一个有关青春年少的故事。记忆深处，是夏日阴天那种墨绿色，厂房里有钝重轰鸣的机器声，花池喷泉里的泥鳅、小黑鱼活泼游动，就连嗅觉都带着抖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评价说：“故事有生气，文字有灵气，表达接地气。抒写青春，却又谈及人生。”



郭红松绘

小小四合院里的“家”与“国”

——读杨晓升小说《海棠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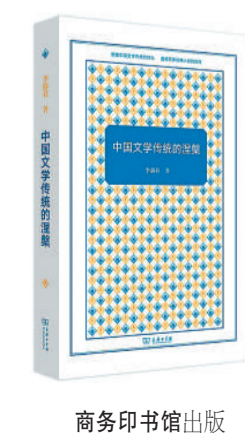
刘凤阳

杨晓升的小说笔力遒劲从容，一向以现实感和现场感取胜，将从温和的纪实风格融于虚构中，且擅长描摹大历史下的家庭生活和个体命运，有“儿女情”，亦有“风云气”。中篇小说《海棠花开》（《小说月报》2020年第11期）聚焦北京一座四合院，抒写一个普通人家三代人百年里的悲欢离合，着力表现的是恒常的人情，亦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赵老太爷是知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民国初年靠着自己的勤奋，用多年积蓄置下了这座小四合院，可谓“春风得意、安居乐业”。唯一让教授夫妇烦心的是，双胞胎儿子大赵和小赵自小不睦，且双双“生性顽劣，无心向学”。既然两兄弟上大学无望，又值“上山下乡”，教授夫妇便决定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兄弟俩的去留。结果，大赵下乡，小赵留城，下乡的人沮丧、留城的人窃喜，谁也不服谁。这加剧了兄弟间的矛盾，从此水火不相容。几年后，到湖北农村的大赵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与同为“知青”的湖北女子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小赵则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工人，娶了纺织女工为妻，组成“双职工”之家，两个小家庭的地位和光景便有了悬殊的差距。随着高考恢复，大赵的两个儿子先后考上了“北大”和“清华”，轰动一时，传为佳话，大赵也回到北京，小四合院有了一段短暂的三代十口人同堂的兴旺时期。与

此同时，小赵的一儿一女高考落榜，让小赵一家尝到了失意者的滋味。但这绝非他们“命运分野”的最终定论。随着赵老太爷和赵老太太先后离世，大赵和小赵也年华老去，在分割四合院房产时，再次采用“抓阄”的办法。这一回，运气到了大赵这边，他抓到了正房。但是，小小的四合院已然承载不下赵家三代人的志向和追求了。大赵的两个儿子远走高飞，扎根在异国他乡，虽然给大赵夫妇挣足了面子，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孤单和落寞。小赵的一儿一女虽说光宗耀祖，但生活过得也相当不错。逢年过节抑或周末，还能回到四合院，围绕在父母身边，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与大赵家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人世间的忧患说来就来”——大赵突发“急性脑溢血”，倒在家中，让老伴束手无策。危难时刻，小赵一家不计前嫌，倾力相助。

时光老去，海棠花如约绽放，四合院里的老老少少，终于步调一致地体悟到：人间最美是亲情，谁也难以割舍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而这一切，都与国家繁荣富强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杨晓升始终带着敏感、坚定和耐心对待笔下的人物，处理漫长岁月里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喜悦、烦恼和困厄，在不长的篇幅里，精当而令人信服地以一座小小四合院为原点，描摹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